



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7JZD0004）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

New Exposition About Cros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文明与跨文化新论

吳楚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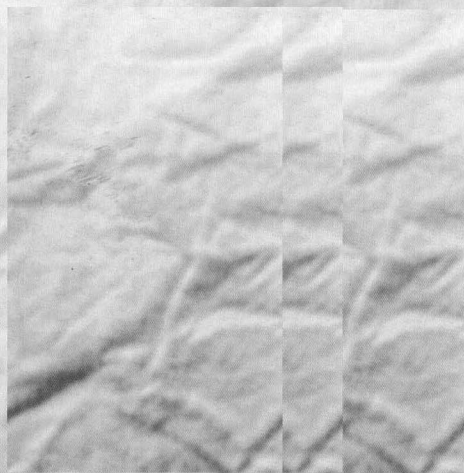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文明与跨文化新论

New Exposition About Cros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吳楚克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与跨文化新论/吴楚克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1108-779-6

I. 文… II. 吴… III. 比较文化—研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4116 号

文明与跨文化新论

- 作 者 吴楚克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乌日恒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779-6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文明论”课程以来，我一直坚持研究文明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我后来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把哲学的思维方法应用到跨文化研究中的确是一种新的探索。在2007年申请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的优势在于“跨哲学与跨民族”的文明理论建构，把关于文明的哲学思考与中国跨民族的文化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对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独特认识角度。承担了这一课题后，我把文明与跨文化研究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加以提升和系统化，完成了本课题中期研究计划，同时，我也把具体的跨界民族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为理论的应用和深入，完成了本课题的前期成果《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

事实上，文明和跨文化的实质和最终结果就是“认同”，不管是文化认同，还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其基础就是对文明类型和跨文化差别的理解与确认。从人类发展史看，不同的文明类型之间事实上存在高低之分，这是导致跨文化交流的客观因素，因为，人类不自觉地会向往更高的文明类型。然而，当几大文明类型的界线明确以后，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趋于激烈，跨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就在激烈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中不断演进和变化，导致跨界民族认同的危机。这应该就是“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

但是，关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研究，属于文明和跨文化研

究的进一步成果，也就是说，在完成理论研究和具体应用研究之后，才接近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核心问题。不过，作为学术研究的探索，也是作为与最终研究成果的一个衔接，我更愿意在这里谈谈关于“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这完全是从《文明与跨文化新论》的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般遵循存在决定意识和经济决定政治的原则，对跨界民族问题进行理论的或实证的探讨，取得了大量可贵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跨界民族问题已经超出经济作用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我们认为，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保持跨界民族判断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种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是决定认同判断力的重要指标。

在环境学中有一个关于人对环境舒适度的测定，其中，人的居住环境中属于自然环境部分是被动选择，也就是说喜欢热带还是温带、喜欢海边还是山区、热爱森林还是草原，在我们出生时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只能从前辈那里承接下来。由此培养起来的居住在一个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生活习俗也会自然地进入出生在那里的人的精神文化中。至于成人以后出于各种各样目的而选择的生活居住地，虽然与成长环境并不直接相关，但影响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地域与民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文化不单纯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精神文化或者物质文化，而是一种适应了地域环境特点并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断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

事实上，文化绝非非物质，也不是仅属于思想范畴，把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时，我们已经偏离了正确理解文化的轨道，正如我们把文明分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时也已经偏离正确

理解文明的轨道一样，这种可以传承的并体现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特征标识，显然是物质与精神的合二为一，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把它们纯粹归属于精神还是物质完全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正如梦境和大脑的关系一样，可以研究梦境，但都是没有离开大脑的梦境，离开大脑的梦境属于幻想范畴。如果说地域环境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大的外部环境，那么，个人居住环境包括社区、居室、陈设、颜色、节日等，也就是说你喜欢平房还是楼房，喜欢白色还是蓝色，热爱火炕还是席梦思床，或者是朝鲜式的格局还是藏族式的土楼，都是可以营造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主动创造出来的。这两种环境含义构成了不同地域人们的生存环境，并努力创造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更加好的生存条件。

我们把环境学中关于人对环境舒适度的概念应用到认同意识的研究中，创造出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这样一个术语，为深入研究跨界民族认同意识开拓领域。我们发现，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的存在依赖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依赖居住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它无法改变，只能被动接受。另一个因素就是依赖居住环境中的个人居住环境，它可以改变，可以主动接受或拒绝。

前一个因素对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作用，类似一个座标图的轴心。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即是以该地域为起源地并建立民族国家，那么，不仅这个民族，包括这个国家其他次要民族都会以此为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地域。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心理适应”地域表现为人的心理本能，一种动物的“回归方向感”，比如生活在草原的民族，对辽阔和荒凉有一种“天然的”喜爱，而生活在热带海洋地区的民族对温热和永久的绿色有一种天然适应力。忽视存在于每个人身体里的这种心理认知的自然烙印，你就不能够充分了解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复杂性和固执性。同样，完全消除这种“回归方向感”至少需要三代人以上生

活在异域文化和民族中。

后一个因素对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作用，如同“定时叫醒器”。如果一个移居到异域国家和非本民族的跨界民族个体，或者以少数跨界民族群体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他们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营造一个使自己感觉如同在家乡的居住环境。尽管大的外部地域环境无法改变，但每天回到家里或者社区当中，心理感觉就会舒服多了，因为，这里的摆设和颜色、结构和样式、身材和肤色，可能更接近于你过去已经培养起来的认同心理基础。这种营造出来的用来满足异域生活的跨界民族认同意识需求的居住环境，以“符号”特征的方式提醒他们：你是一位跨界民族，你的心理喜爱和当地民族不同。

这两种影响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它们的变化曲线，我们用“心理适应度”来描述。那么，来自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可以进行以下的分析。

对自然环境有强烈依赖感的民族，其居住和生活习惯往往也带有强烈的心理依赖性。也就是说，生活在自然环境特征突出的地域的民族，其自然特征明显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体貌和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对生活在相同地域的民族有较强烈的认同感，而对异域民族的特征和生活方式也是比较敏感的。因此，对于特征比较接近的地域建立的民族国家来说，即使存在跨界民族问题，也不是来自民族认同方面的，而是来自国家认同方面的，他们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是如何区分，而不是如何融合，是如何解决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国家利益冲突。如中亚五国、北欧四国。另外一种情况是，当一个自然环境特征明显的主导民族国家的部分人以少数民族的状态居住在不同国家，就成为典型的跨界民族，这类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如果我们把相同民族却分别以少数民族状态居住

在不同国家与主体民族国家的部分人以少数民族状态居住在不同国家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认同意识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中一个是主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当今世界发生的国家间跨界民族冲突或国家内部民族矛盾，主要是由其中一个是主体国家民族的跨界民族造成的。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首先需要我们了解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基础。民族的自觉区分肯定要晚于种族的自觉区分，在相同种族内部出现不同族群差别是在国家产生以后；近代以前，这种不同族群之间的彼此消长都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融合过程，以民族战争或土地兼并逐步扩大或者缩小某一民族的力量，民族间的特征和生活方式在一个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融合着。而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性质首先表现为民族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受到该民族几乎所有人的支持并保护这个民族以统一的声音与其他民族交往，当一个民族被赋予国家的形式，也就意味着她可以通过国家来有效地保护自己，并可以不断扩大本国家的主体民族。近代以来，那些最先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以此凝聚国家力量进攻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族基本上都生存和发展下来了，而那些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却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灭绝和最疯狂的国家吞并。世界近代史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脚步，一幅充满血腥殖民史和民族压迫史的画卷也逐步展开，原来画卷上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以“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争先恐后地开展工业化竞争，以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来瓜分世界。我们不对这幅“血腥”画卷提出道德上的评价，单纯以黑格尔的“历史总是以恶的方式推动人类进步”的观点出发，我们当然可以肯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所取得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伴随而来的“全球化”，因为，人类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智慧像现在一样投入到如何征服自己的同类方面，也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把最珍贵的物品投入到杀人武器的制造方面。因此，能否使一个民族发展成为

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能否独立存在下去的基本原因，那么，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对以本民族建立的国家有强烈的认同心理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到，俄罗斯彼得大帝开始的斯拉夫人的征服计划和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结果是欧洲各国开始承认彼此的主权。但是，各国也意识到两个民族国家的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在一个强大国家的面前，另一个国家是无法战胜侵略的，所以，国家间的联合就成为必然。那么，哪些民族国家可以联合？容易联合？甚至可以组成联邦国家？相同种族、相近民族、相似语言、相邻而居就成为首选因素，只有像日本这样的“文明边缘”民族才会出现识别误区，成为别国的帮凶却并不被认同。这种“生存联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具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划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则被划分为东西两方。东方代表一种颜色；西方代表另一种颜色，先前形成的跨界民族规则被颜色的对立所取代，种族、民族和地域都不能取代政治颜色的区分。世界性的国家政治联盟压倒了民族国家间的文明类型联盟，这个历史时期为苏联解体以后各国跨界民族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其三，由于主体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时机不同，他们的规模、制度、民族构成、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不相同，这就使跨界民族在国家间矛盾冲突中首当其冲提供了条件。在世界格局划分的几次重大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除了原来就是重要的封建帝国转化为近代工业化国家以外，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近代以来出现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中诞生的，这些国家一般都属于落后和发展中国家，当初民族解放和独立是整个民族革命运动的核心，民族认同意识也就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一旦独立成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东西方分裂的时代，跨界民族的认同选择被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区

分，因此，作为群体性选择基本上是被动的清晰的。但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时代，跨界民族的作用也就日益显现出来，甚至侨民也许会成为国民。例如越南在 2008 年 11 月就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了。因为，150 多万美籍越南人对越南经济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此时，那些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牺牲的人是最可悲的，他们最痛恨的民族敌人再一次从精神上奴役了他们。在解决了生存权问题以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发展权问题上依赖的广泛性促使他们必须与跨界民族打交道，

其四，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一些接收移民的大国虽然民族身份并不被承认，但种族差别和文明类型差距往往比民族差异更明显地突出出来。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在他们那里以种族问题的方式出现，因而，种族问题是移民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最敏感和突出的社会问题，有时，他们把这类问题演化为文明类型的差异，由此教导人们接受先进的发达的西方文明类型。美国著名战略学者亨廷顿就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文明类型差别并宣扬西方文明的类型。他告诫美国的领导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日益增多的别的文明类型的美国社区文化圈；他们的存在否定了美国文化的主导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美国并没有像中国、德国、印度那样的主体民族拥有的传统文明，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没有根基，所以，其他文明类型的移民就可以在美国形成自己的文化社区，如墨西哥人、华人、西班牙人、非洲黑人都可以有形成带有自己文化特征的社区。这种发展趋势将会在未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性质，亨廷顿的观点并非耸人听闻，事实上，第 44 届美国总统选举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文明类型正在成长变化中。

其五，单一民族国家在世界上虽然是极少数；但并没有因为自身民族与国家的一致就摆脱跨界民族的纷扰，事实上，单一民

族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大,因为,如果承认同一民族都拥有国籍,就等于民族身份等同于国籍身份,就等于承认处于跨界状态的同一民族为本国人,这势必造成跨界民族矛盾。如韩国的同化政策。但如果只承认国籍,就等于将非本国的同一民族的排斥为别国人,如日本等只承认唯一国籍的国家。如果是同一民族组成不同的国家或同一民族国家分裂为两个国家,如非洲的南北也门和亚洲的南北朝鲜,他们之间面临的跨界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往往演变成国家冲突。苏联解体后全球出现的民族走向国家浪潮,再一次证明世界格局的重组划分是一个历史常态,那种以为世界被垄断资本主义瓜分完毕的结论只是一个我写历史时期的结束,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并相互影响,重组划分的可能性就存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种族差别导致文明差别的冲突会更加频繁,民族差别将在国家范围内趋于平缓,而跨界民族矛盾将由于国家间的冲突而趋于激烈。

总之,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要注意历史纵向和现实横向的交互影响。我们发现,种族意识是被完全掩盖的真实存在,尽管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但也因此加剧了种族差别造成的现实矛盾,谁也无法否认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种族问题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最敏感的因素,说明它不是不存在而是“太”存在了。同时我们发现,在种族层面或者大民族文化差异层面,自然的地域的因素才显现出来,正如那些“思乡”和“怀念”的诗歌或歌曲描述的那样: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在那辽阔的大海边、在那远方雪山的映衬下、在那一望无际的森林边上,等等。现代生活并没有减弱族群起源和发展的地域性,有时反而加强了人们的领土意识,这恐怕也是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作用。

在边疆政治学的范畴里,跨界民族的逻辑含义不同于跨国民族。因为,一方面跨界并不完全都是跨国,在争议区或者分治区

就是跨界而不是跨国了，特别是在中国，跨界民族主要是指边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跨国民族更倾向于以国民身份区分，而边疆政治学强调边疆少数民族跨界而居并包括了由于迁徙和移民形成的跨界民族，汉族移居国外应该属于华侨，不能用跨界民族来看待。显然，从跨国民族角度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跨界民族存在一定偏差，不能准确反映跨界民族的性质和状况。

因此，我们研究的跨界民族，第一个条件是非主体民族，也就是他们在居住的国家中属于少数民族；第二个条件是该民族有以本民族为主体构成的国家或者为区域自治民族；第三个条件是分治区、争议区或未统一区域居住的非主体民族。中国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德昂族、苗族，以及区域自治民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他们具有跨界民族典型特征，因而，在联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跨界民族除了自然环境给他们的认同意识带来不可选择和不可轻易消除的影响外（移居原出生地第二代以后影响不同），他们还会创造一个使自己感觉舒适的社区环境和居住环境，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种影响因素。

对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产生作用的第二种影响因素即“社区特征和居住特征”，分属两个层次。我们先来研究“社区特征”，它主要是指跨界民族居住区域由于小聚居而形成的具有该民族特点的社区环境。显然，我们不能给出多大或者多小才属于这类社区环境，但起码我们会从感官上感觉这个地方不同于周围其他民族居住区。社区环境比居住环境影响更大，但也更难形成，然而，一旦出现就会对其他分散居住的跨界民族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从而又会强化社区环境的民族特征。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这个民族社区就会演化为具有鲜明民族文化意义的特殊社区而存在下来。因此，跨界民族在异域形成居住社区的动力是同族人不断地加入，而吸引他们不断加入的原因又是多方面

的。

从历史上讲，可能长期以来该地区就一直存在跨界民族移居的情况，因为相互曾经发生战争，而导致当时人口流入流出，后来就此定居下来。此种情况是形成早期跨界民族的一个普遍原因，当然，如果我们继续追寻更为久远的历史原因，那么，从部族通婚到民族差别形成，再到民族国家产生，再到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大规模征战，都是导致全球人口不正常迁徙和移居他乡的原因。

从外部讲，迁入国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性，使其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形成广大的国土和多民族共同生活的一个伟大国家，并直接影响周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充分证明从封建时代的羁縻怀柔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文明特征和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始终是吸引各民族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纯粹的经济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选择，特别是那些单一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成为无法容忍非本国国民长期居住的内在原因。

从宗教上看，非宗教民族或宗教信仰宽松的民族国家，其跨界民族居住选择会比较自由。宗教产生以后，特别是西方国家在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时期，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冲突加剧，致使宗教仇杀和排斥成为领土扩张和种族屠杀的理由，宗教因素导致的民族迁徙也是形成跨界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近代西方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也是一些西方人流落他乡异国，或迁入北美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还是流落异域的土尔扈特人的回归，他们感动了几代人，说明族源文化和宗教宽容的吸引力。

从内部讲，一个民族在其强大或者衰落的不同时期，都容易出现民族输出或输入，如果该民族的主体部分依然独立和强大，就容易出现一定范围的民族聚居而成为跨界民族；如果该民族的

主体部分衰落,就可能促使输出或输入的部分民族成员与当地民族融合。因此,跨界民族的发展轨迹是与该民族的主体部分的是否兴旺发达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程都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形,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段,就已经存在了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做出判断,并不说明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未来趋势。

除此以外,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些飘流异域的民族却长期保留和坚守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什么主体民族在吸引、鼓励或者召唤着他们,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库尔德人等。尽管宗教信仰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应该肯定其民族自身精神气质和文化遗产特征产生重要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事实上,在民族迁徙和移居日益频繁的时代,过去保留民族特征的自然环境条件基本上限制在当地,更多地却表现为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遗产,也就是以更为个性化的特点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即“就是这样的人”。

因此,在异域生活的跨界民族会不自觉地营造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区居住环境,以便使自己原有的认同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环境”肯定,使认同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适应。这就是我们强调的“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事实上,认同意识和认同心理是两个不同概念,尽管它们的概念范畴有所交叉,但认同意识更多的是指认同的思想方面,认同心理更多的是指认同的心理基础,而认同的心理基础一方面来自外部时空环境,一方面来自内部生理构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认同心理,并成为认同意识的心理基础。所以,认同心理的“适应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决定了认同意识的积极或消极,顺应或反抗,接受或拒绝。因此,来自大的民族社区环境或者是小范围的居住社区环境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影响主要有:

首先是长期性。跨界民族已经脱离了民族起源地自然环境的

影响,势必努力营造一个小范围的社区环境或者是居住环境,来满足认同心理的自然要求,这种心理的自然要求表现为一种心理倾向,会以潜意识的方式长期存在。根据心理学关于潜意识的理解,它是人们行为方式特点的决定因素,潜意识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并不突出地表现出来,但在形式选择、行为方式、爱好、审美等方面,会表现出固有的倾向。跨界民族为了缓解特有的“认同焦虑”心理而在特定的生活范围长期表现出认同意识的倾向性;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是简易性。由于不可能完全创造一个本民族的生活环境,跨界民族只是在可能的方面,或者生活习惯方面营造一个使自己感到舒服的适度氛围,因而,经常表现为简易性。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如由寒冷的北方到温暖的南方,你根本无法在过去感受过的相应季节度过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只能在允许的条件下,创造一个简单的环境来满足自己的认同意识和审美要求。在北美过圣诞节显然要超过在南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冬季北美白雪皑皑,提供了圣诞节的氛围。

第三是宗教性。宗教往往是跨界民族保持认同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宗教信仰本身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时,特定的形式或者物品就带有十分鲜明的民族宗教特点,这就构成民族认同意识的标志物,具有特殊的跨界民族认同心理对应意义。尽管回族并不是一个跨界民族,但我们可以从回族社区发展的历史,看出跨界民族社区环境的发展变化。比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民区。据记载,解放前围绕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形成回族聚居的一条街,叫回民街;解放后,以这条街为中心逐步扩大为回民区;改革开放后,这条回民街建成伊斯兰大道。现在,当你走在这条布满穆斯林金顶建筑的宽阔的大街上时,你仿佛置身于某中东伊斯兰国家。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小范围民族社区环境逐步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民族社会生活环境的例子。

第四是传承性。如果跨界民族社区环境一旦形成,即使是十分简易和狭窄范围内,也会具有传承性,只要不发生较大变动,居住在这里的同一民族会保持有特色的部分环境,因为,它们会主动带来跨界民族心理上的适应感,唤起一种久违的认同意识,因而,如果不是主动搬迁或拆掉,象征性的存在物会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当周围环境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时,人们会忽然发现,原来存在在这里的这个东西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哈尔滨旧城区改造时,人们突然发现白俄罗斯留下来的几处建筑还立在那里,它们代表的意义在其他建筑都还存在时并不突出,当周围都已经是高楼大厦时,这些建筑的“符号”意义就凸显出来。

第五是非理性。在一些情况下,跨界民族认同心理的环境标志是其他民族看不出来的,或者体会不到的,它可能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符号,或者是普通建筑,或者是普通颜色,或者是某种格局,总之,只有本民族的人才能够体会出其中的含义。如阿拉法特头巾为样式的所有装饰,代表着解放巴勒斯坦运动一样。

当今世界,跨国居住和移民浪潮日益兴盛,促使这些跨界民族利用居住社区或者居住环境,来营造让本民族认同意识得到肯定的标志物,提高民族认同心理的适应度。这种行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属于民族认同心理为适应新环境而创造的,它为认同心理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即一定的适应度。如果低于这个适应度,他们可能就要面临不是彻底改变自己,就是再次迁徙的命运;如果高于这个适应度,跨界民族范围就可能扩大并形成固定的民族社区。完全正好适中的状态是没有的,或者适中永远是短暂的。

综上所述,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所代表的是跨界民族认同心理认可范围的程度,这个范围包括来自民族起源地的自然环境特征所积淀在跨界民族潜意识当中的心理适应倾向性,也包括跨界民族在异域主动营造满足认同心理需求的社区环

境，还包括使跨界民族认同心理舒适和放松的居住环境。这三条曲线的波动构成跨界民族认同意识心理适应的“度”。完全清楚地表明这个“度”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我们今后研究的范围，起码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探索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诸多内容事实上还只是初级阶段，过去的认识方法和范围有很大局限性。

一个让我们不能忘记的跨界民族脱离主体民族的悲剧是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无论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就它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和民族灾难来说，无疑是近现代欧洲史及至世界史都应该牢记的民族悲剧。任何倒退都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可能存在跨界民族的自主性要求，但它违背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正常规律，带有浓厚的种族血缘色彩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含义，这就是被利用了的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倾向性。所以，清醒地了解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一个重要问题。